

浴火“难”生：全面抗战时期浙江的省志编纂*

吕克军

提 要：全面抗战时期，为振奋民族精神，余绍宋等文化精英秉承“文化复仇”意识，提议并主持重修《浙江通志》；在抗战相持阶段，设立了浙江省通志馆，以科学修志理论指导，在体例、方法、内容上多有创新；《浙江通志》计划分4期于8年内修成，因抗战时期条件不谐进展缓慢；通志馆在抗战胜利之时返回杭州，却因国民党政权穷兵黩武而编纂失败；抗战时期重修浙江省志的经验教训可为新时期省志编纂之镜鉴，方志编纂应自觉坚持党的领导，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关键词：抗日战争 浙江 省志 文化复仇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作为“淞沪会战”后方的杭嘉湖地区在上海失守后，于当年年底陷落，成为“沦陷区”，浙江省政当局节节退却到浙西南地区。日寇发动多次战役，两浙大地被战火笼罩。日寇对统治区进行疯狂杀戮和掠夺，对文化的破坏十分严重，如杭州沦陷期间浙江图书馆损失图书资料达10万册^①；郁达夫先生“个人之损失而论……最可惜的是宋元明以来，及清末之类书”^②。日伪政权还实行“奴化”文化政策，宣传“建立东亚新秩序”和“大和民族精神”，图谋“在精神上，摧毁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③。面对日寇侵略，各阶层进步群众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下，在各领域进行艰苦抗战。在紧张的抗战中，一些方志人进行了浙江省志的编纂，这在全国范围内的民国时期的省志编纂中是不多见的。^④

浙江因是国民党政权统治中心区域和丰厚税赋缴纳之地，成为日寇侵略的重点地区之一，抗战压力很大。但在抗战艰难环境中浙江的文化精英为什么会启动大规模省志编纂？这次省志编纂的进展如何？有什么创新之处？最终为何历经战火而未能修成？这次省志编纂对弘扬民族精神和浙江优秀传统文化起到了什么作用？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特别是在关于全面抗战时期浙江省志编纂的研究成果还很少的情况下。^⑤基于此，本文将在厘清这次重修浙江省志史实的基础上，对其背景、编纂历程、特点、经验教训做初步阐述，以就教于方家。

一 文化复仇：浙江省志重修的启动

全面抗战初期，浙江当局在军事上缺少有效抵抗，节节败退，在一个多月时间内丢掉了大部分浙西地区。^⑥又由于国民党政权的战略重点放在西南地区，浙江的兵力难以形成有效抵抗。日

* 本文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一般课题（项目编号：2022CYGP）成果。

① 参见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著：《日军侵略浙江罪行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33页。

②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著：《日军侵略浙江罪行史》，第132页。

③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55页。

④ 据初步统计，中华民国时期全国共有23个省进行省志编纂，在全面抗战时期仅有5个省编修省志。

⑤ 相关研究仅有余子安《亭亭寒柯——余绍宋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一本著作，以及沈松平《论〈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的修纂特点》（《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21年第4期）、沈松平《从余绍宋看民国志家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扬弃》（《宁波大学学报》2003年第12期）、徐伯凤《方志学家余绍宋》（《浙江档案》2006年第2期）、余子安《余绍宋与方志学》（《浙江学刊》1983年第6期）等几篇论文。

⑥ 浙江习惯上称钱塘江以东、以南地区为“浙东地区”，以西以北地区为“浙西地区”。

寇在对“沦陷区”进行政治压迫、经济掠夺的同时，还对沦陷区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和文化侵略，民众情绪十分沉闷。面对全面抗战初期一部分人的沉闷甚至恐慌心态，同时在浙江“复兴社”、CC系的力量还很有实力，1937年年底重回浙江主政的桂系黄绍竑感到备受掣肘。中国共产党秉承民族大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黄绍竑进行团结抗战。1938年3月，周恩来在武汉和黄绍竑会晤，勉励黄绍竑坚持团结抗战立场，支持爱国青年和文化运动统战工作，坚定了黄绍竑抗击日寇的信心。在坚定抗战信心的过程中，浙江优秀传统文化激励着黄绍竑和全省人民，春秋战国时期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在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黄绍竑认为“两越是历史上有名的复兴之地，兼有传统的优点”^①，提出“刷新政治、保卫浙江”口号，并在全国第一个提出《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其中包括“普遍提高人民之政治认知及文化水平”“坚强人民之抗战精神”的文化纲领。对于深刻融入浙江人民血脉的“卧薪尝胆”文化基因，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1939年3月周恩来视察浙江抗战时，在浙西临时中学鼓励爱国青年时讲道，“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教训，所表现的民族意识和战斗精神光耀千古”^②。认为其中忍辱负重、奋发图强的奋斗精神和拼搏奋斗、无所畏惧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全面抗战中具有重要意义。

“卧薪尝胆”的民族精神深烙在浙江文化人心中，是融入他们血脉的精神动力。1939年11月6日，浙江省第一届临时参议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余绍宋提交《拟请省政府设委员会征集通志、县志史料》提案。提案申明重修浙江省志之重要意义，“文献赖志书以存，其为重要，自不待论。唯向来省县政府，多未措意及此。故一遭变乱，散佚无遗。……其损失之浩大，岂容思议”^③。指出由于抗日战争对文献造成极大破坏，提议重修省志以保存民族文化。他认为“文献是历史根基，无历史则无人人类社会，失其凭藉，而民族精神亦无从资以发挥”^④。所以要通过编修省志传承浙江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以文化起到鼓舞战士和民众抗战信心的作用，展开对日寇侵略的复仇。经过余绍宋等人的努力和浙江主政者黄绍竑的支持，提案获参议会通过。但因时局动荡，物资匮乏，缺乏修志的基本条件，省志编纂工作未能及时实施，一拖便是近三年时间。

进入1942年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浙东、浙西地区开展敌后抗战，牵制日本侵略力量，日寇的进攻和浙江省政府形成了均势状态，民国浙江地方政府在浙西南地区能够维持一个较为稳定的状态。5月，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民政厅厅长阮毅成等提议重新编纂浙江省志，省政府同意并成立“浙江省史料征集委员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属意余绍宋主持此事，特致信余绍宋说，“通志为一省之史乘，网罗文献，垂示来兹，所系綦重。……事在千秋，当仁何让”^⑤。当月浙江省史料征集委员会成立，任命余绍宋为主任委员，委员由主任推荐，余绍宋推荐了叶左文、刘祝群、袁道中等13人。浙江省志编纂正式启动。1943年8月1日，“浙江省史料征集委员会”改名为“浙江通志馆”，为省志的具体承编单位，馆址在云和县大坪村的民宅梅家大屋，余绍宋为馆长。大坪村位于云和县城南3公里的白龙山麓，因有较宽阔山地而得名。大坪村当时只是有着二三十户人家、100多口人的小山村，全村有耕地100多亩、山林900多亩，山上古木参天，修竹摇曳，环境幽静典雅。通志馆是一座一二十间房的传统民居，设馆长、副馆长、总编

① 黄绍竑：《黄绍竑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85页。

② 童少锋：《黄绍竑与周恩来抗战时期三次历史性会晤》，《云和抗战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第73页。

③ 余子安著：《亭亭寒柯——余绍宋传》，第183页。

④ 余子安著：《亭亭寒柯——余绍宋传》，第183页。

⑤ [民国]浙江省通志馆编：《重修浙江通志稿》（标点本）（第一册），方志出版社，2010年，第4页。

纂各1人。内设秘书室、采辑室、总务课、会计室、统计室、人事管理员室等。通志馆聘请编纂、特约采访员和各县采访员。通志馆的编制在成立之初为34人，1944年省政府统一裁员减为24人，后经争取定为30人。后设立浙东、浙西办事处和青田的南田办事处后，工作人员在4个地方办公，人员不敷使用，到1945年增至40人。通志馆罗致了当时众多修志精英，如台州学者、目录学家项士元，德清水利专家俞寰澄，青田文史专家刘祝群，平湖戏曲史研究家、教育家钱南扬，诸暨学者蒋麟振，杭州学者钟毓龙、韩登安、邓冶欧、谢燮堂等，一时少长咸集，群贤毕至。

“文化复仇”的抗战意识和民族精神深深影响了这部省志的编纂。余绍宋在给黄绍竑的信中写道，“近遭敌寇之乱”，“典章文物，荡焉无存”^①，显示出对日寇破坏中华文化的憎恶之情。孙延钊先生的认识则更为深远，“验诸往读，以筑新猷，因革而损益之，以求切当与由来有浙之省情，则舍通志，无可取处”^②，期望这部省志编纂对浙江抗战及之后的发展发挥长远作用。这部省志的体例纲要中写道，“我中华民族革命之精神，由孕育而发扬光大，浙人实与有力，浙事亦与有荣”，强调在抗战时期要传承与弘扬革命精神。体现在内容上，这次省志编纂特别重视对抗战史实的记述。如在“户口”部分，要求详细记述日寇的杀戮情况和我方抵抗形成的伤亡情况；在“社会”部分中的“生活情形”“职业概况”中，要求记好“因抗战变动情形”^③；在“教育”部分的“学校制度及经费”中，要求记述好“战时教育”，在“社会教育”中要求记述好“其他战时施教”；在“交通”部分中的“铁路”“公路”中，要求记述好“建筑经过及战时破坏情况”；在对浙江财政中重要的“盐务”中特别要求记述好“战时影响”；在“军事”部分更是对抗战相关史实予以浓墨重彩地记述。体现在记述方法上，编纂者认为之前的省志对“兵事，如宋末抗元、明代擷御倭、残明抗清，以及胜朝鼎革之际，有系民族兴衰成败之故者，尤嫌漏略”^④。尤其对抗日战争，“近十年间之抗敌战绩，尤关重要，未容或忽”^⑤。发挥好“记”能翔实记述的优点，对抗战史实进行详细记述。

二 中心南移：省志的创新及编纂进程的迟滞

省会杭州位于浙江北部，杭嘉湖地区历来为浙江的财赋重地，文风昌盛，所以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杭州及周边地区是浙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浙南、浙西南地区在这几方面都落后于其他地区，本不利于省志这样大规模文化工程的开展。但全面抗战的爆发改变了这个格局，偏远小县云和成为临时省会，杭嘉湖的工商企业迁往浙西南（丽水），迅速带动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文化上，大批原在上海、杭州等地的文化精英云集丽水进行民族抗战；《东南日报》《浙江日报》在丽水出版；新知书店、生活书店、浙东书店在浙西南开办分店；大批大学、中学、小学内迁至浙西南；冯雪峰、潘天寿、阮毅成、余绍宋等知名文化人汇聚浙西南，使这里陡然成为全面抗战中后期的文化中心，促进了浙西南地区文化的全面进步。

正因为“中心南移”及其文化集聚效应，促进了浙江通志编纂的开展，并在编纂理论、体

① 余绍宋：《复黄主席书》，《浙江省通志馆馆刊》，创刊号，民国34年（1945）2月15日。

② 孙延钊：《发扬浙江固有精神建设新浙江》，《浙江省通志馆馆刊》，第二卷第一期，民国35年3月1日。

③ 余绍宋：《浙江省通志编纂大纲草案》，《浙江省通志局馆刊》，创刊号，民国34年2月15日。

④ 《〈重修浙江通志〉初稿体例纲要及目录》，[民国]浙江省通志馆编：《重修浙江通志稿》（标点本）（第一册），第25页。

⑤ 《〈重修浙江通志〉初稿体例纲要及目录》，[民国]浙江省通志馆编：《重修浙江通志稿》（标点本）（第一册），第25页。

例、方法及内容上多有创新。在省志编纂理论方面,余绍宋等人在总结之前编纂通志的经验教训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其一,他批判封建时期浙江省志编纂的缺陷,认为雍正《浙江通志》“除经籍门可称周密及榷税海防数门略可称道外,大部分将各府县之志所载各门剪贴而成;所载事项涉于全省而得谓之通者盖寡,似不得称为佳志”^①。应认真吸取传统方志编纂的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拒绝吸收传统志书精华,而是要加强“新旧之沟通”,秉承“科学之理”予以甄别采用。同时,他还指出雍正《浙江通志》“就其体例言之:不分纪传考略,仅将各门类排比成编;既无史学常识,遑言剪裁,是直为一种类书,不足以登志乘之林者也。即以排比论,亦无意识,疆域山水之间,忽插入建置;关梁水利之间,忽插入古迹;兵制海防之后,忽接风俗物产祥异三端;列女之后,忽编祠堂寺观;皆似随时随意为之……时异世殊,新型事业,至为繁颐,尤不能不更易体例以求实用”^②。认为现代省志编纂要纠正这些弊端。其二,余绍宋认为通志编纂要积极学习现代史学理论,以其指导省志编纂工作。他指出,“今则亚欧著作于法皆得自由,而史学昌明,深知一事一物,皆含有史之性质;历史之为物,亦不仅限于政教数端,而广及于社会全体,殆无疑义”。提倡“今兹修志,必以史法为归,以现代为准,无可结识;其条例容更端言之”^③。其三,在编纂中要坚持科学精神。如在制定篇目时有“星野”不应再设立的意见,余绍宋没有贸然做出决定,提出“须请天文专家研究其有无价值,如不可信,则略而不载”^④。著名科学家竺可桢专门写出《论通志星野存废问题》,指出“星野之说,末之科学,全属诞荒,即稽古籍,亦多自相谬误”^⑤,认为“星野”概念是不科学的,在省志篇目中应予以删掉。通志馆最终接受竺可桢的意见,删掉了“星野”门。还有学者对浙江水利、粮食做专门研究,在省志编纂中吸收具体学科的新成果。

在省志体例上也做了创新。余绍宋提出省志的体例必须和县志的体例予以有效区分,指出“窃谓通志之体例,须通于各县而为综合汇通之记载,使阅者瞭然于全省之情形,查往知来,而因以革损益之依据,无为得之”,“苟各县俱不许修志,则亦已矣;不然,亦何贵有此叠床架屋之作”^⑥,认为省志要真正起到反映一省各领域全貌的作用,要融会贯通,而不是各县情况的简单相加。同时,他又指出雍正《浙江通志》类似于类书,其门类编排随意;全面抗战时期的省志所处年代已是现代化起步的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等方面和二百余年前雍正封建时期大相径庭,所以不能再继续采用传统省志的体例。从《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的体例来看,虽然不是严格按照“分纲列目”原则横排门类,但也不是“细目并列”,基本上还是按照地理建置、民族、文化、政治、经济、人物排列,是适合当时社会发展情况的。另外,这次省志编纂还设立“大事记”,纵述史实,已基本上是现代的志书编排体系。

对于编纂方法,余绍宋提出“五纲”,即纪、考、略、传、谱。其中“纪”即为“大事记”;“考”即为“述自然现象及历史遗迹诸端”,包括疆域、地理、民族、社会、田地、物产、艺文、古迹等;“略”即为“述管教养卫诸与政治有关者,事属现在,含有方略策略之义”,包括党务、议会、一般行政、司法、教育、实业、交通、财务、粮政、军事、宗教、建置等;

① 余绍宋:《略评旧浙江通志兼述重修意见》,《浙江省通志局馆刊》,创刊号,民国34年2月15日。

② 余绍宋:《略评旧浙江通志兼述重修意见》,《浙江省通志局馆刊》,创刊号,民国34年2月15日。

③ 余绍宋:《略评旧浙江通志兼述重修意见》,《浙江省通志局馆刊》,创刊号,民国34年2月15日。

④ 余绍宋:《略评旧浙江通志兼述重修意见》,《浙江省通志局馆刊》,创刊号,民国34年2月15日。

⑤ 竺可桢:《论通志星野存废问题》,《浙江省通志局馆刊》,创刊号,民国34年2月15日。

⑥ 余绍宋:《略评旧浙江通志兼述重修意见》,《浙江省通志局馆刊》,创刊号,民国34年2月15日。

“传”即为“正史列传之例”，包括人物、列女、宦迹等；“谱”即为“正史表之例”及“诗文之属”辑为“文征”，最主要包括选举中的考试、学制、议员，以及职官等。^①“五纲”是在吸收章学诚志书记述方法基础上予以创新，成为《民国浙江省通志》的基本记述方法。

这些创新直接体现在重修《浙江通志》的内容上。这一点可同雍正《浙江通志》、民初沈曾植《民国续修浙江通志稿》进行简单比较。雍正《浙江通志》的内容包括诏谕、圣制、图说、星野、疆域、建置、山川、形胜、城池、学校、公署、关梁、古迹、水利、海塘、田赋、户口、蠲恤、积贮、漕运、盐法、榷税、钱法、驿传、兵制、海防、风俗、物产、祥异、封爵、职官、选官、名宦、名臣、忠臣、循吏、武功、儒林、文苑、孝友、义行、介节、隐逸、寓贤、方技、仙释、烈女、两祀、寺观、陵墓、经籍、碑碣、艺文、杂记等52门，是典型的传统志书形式。《民国续修浙江通志稿》的编纂时代已是民国初年，但沈曾植为民国遗老，内容承袭雍正《浙江通志》的内容，仅加上大事记、地方自治、地质等少数内容，仍是传统省志模样。而余绍宋的《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包括叙例、大事记、疆域、地理、民族、物产、建置、名胜古迹、著述、艺术、党会、议会、司法、行政、财务、盐务、国税、计政、粮政、军事、水利、交通、实业、宗教、考选、人物、儒学、文征，虽为内容不完备的稿本，但在记述内容的丰富程度及科学性上明显优于前两部省志（稿）。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心南移”带来的文化集聚，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但是，随着抗战的发展，国民党政权日益“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在国民党顽固派的攻讦下，黄绍竑的立场也出现后转。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进步力量进行军事和文化“围剿”，无力抵御日寇的进攻，造成了宁绍战役和浙赣战役的重大失败。浙江被日伪政权分割统治，使编纂省志所需文献的采集更无法进行。浙江通志馆虽然设立浙东、浙西两个办事处，但资料的收集和到各县采访有很大困难，“目前多数县份被敌侵占，受战争影响交通阻塞，未能周历采访”^②，可谓举步维艰。此时，浙西南地区虽能保持偏安状态，但国民党政权抵抗乏力，全省战乱频仍，文献浩劫，史料缺失。杭州沦陷后，机关单位仓皇撤离，档案文献损失严重。省政府及通志馆驻地乃僻壤山区，交通不便，史料收集更加困难。经费也十分紧张，抗战时期，物资困乏，物价昂贵，省财政拨款极少，难以保证修志的正常支出和人员生活需要。所以，虽然在编纂启动时计划分为4期，每期2年，共计8年编纂完成。第一期详细地规定了馆务、采访、编辑的任务；第2期的任务主要是编纂成省志的资料长编，并对前期编纂成的志稿和各县志稿进行审查；第三期的任务包括对上期编纂的志稿继续进行审查，并进行实地调查，另外还计划举办“浙江文献展览会”；第四期则全部完成省志编纂，具体包括“各部门之补充剂考核、全部志稿文字之修饰及整理、文征之完成及审定、印刷及校勘等”^③。计划虽然规定的非常翔实，任务也很具体，但是却无法完成，通志馆修志人员的工作生活更是异常艰苦。余绍宋有诗描述，“福利原如此，清廉岂有加。漫嫌学圃鄙，相率并耕夸”^④，在修志之余还要靠种植瓜菜来补贴生活。在这种艰苦的境况中，通志馆的同仁进行着文献征集和史料收集这些需下大力气、默默无闻的工作。为更好吸取、总结浙江历史上的通志编纂经验，修志人员对浙江方志编纂的历史进行了整理，其中洪焕椿做了很多努力，他先后撰写多篇论文，如《浙江通志纂修源流述评》，对从东汉直至民国具有通志性质的志书进行介绍和论述；《浙江方志综录》，对浙江现存的通志和郡县志做了介绍；《浙江历代名贤年谱综录》，介绍

① 参见余绍宋：《浙江省通志编纂大纲草案》，《浙江省通志局馆刊》，创刊号，民国34年2月15日。

② 《本馆第一次馆务会议记录》，《浙江省通志馆馆刊》，第一卷第三期，民国34年8月15日。

③ 《本馆之进行计划》，《浙江省通志馆馆刊》，创刊号，民国34年2月15日。

④ 余子安著：《亭亭寒柯——余绍宋传》，第190页。

了浙江各地名贤的年谱资料，这些都为《浙江省通志》的编纂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资料。其他还有庄一拂撰写的《樵李女诗人辑例目》和褚辅成撰写的《浙江辛亥革命纪实》等。

在这些综合因素作用下，省志编纂进展十分缓慢。1944年2月17日（农历），浙江通志馆召开第一次馆务会议，余绍宋在报告中坦承，“时间上实延误多日，以往工作实乏表现”^①。在人员聘请上，“本馆限于预算，职员俸给微薄，以致延委颇难。尤其省府嘱代物色编纂人才，觅致尤为不易；孙总纂又因为另有任务，迄今未到馆”，所以“目前编纂事务尚未能达到”^②。12月20日，通志馆召开第二次馆务会议。余绍宋首先就成立浙东西办事处经过暨南田办事处缘由、半年多来的编纂工作开展、县采访员的聘请及工作情况、裁员经过等4件事项做了报告。随之，浙西办事处张主任就浙西办事处的工作开展情况做了报告；之后，浙东办事处提出工作报告；通志馆总务处、采访课分别提出工作总结。余绍宋提出几个议案交付讨论，对通志馆工作开展中的多个问题进行讨论，发现存在一些具体困难，如通志馆和各办事处联络不便，经费、人员不足等问题。经研究决定，浙东、浙西各办事处的经费函请省府予以增加。但此事最终未能落实。

全面抗战时期的浙江省志编纂，通志馆修志同仁众志成城，确立了各项修志的规章、流程，为之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但总体来说进展迟滞，成效不佳。

三 浴火“难”生：省志编纂的失败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两浙大地迎来“浴火重生”的机遇。余绍宋欣喜若狂，赋诗一首，感慨“何意忽能逢此日，从此不必滞他乡”。他在通志馆返杭前就和省政府联络馆址，因为通志馆是在云和新成立的机构，原在杭州没有办公场所，几经周折租赁下里西湖（现北山街）的梅庐作为办公场所。至此省志重修纳入正轨，修志条件得以部分改善。这是加快编修进度的好机遇，总结前期工作，“回溯第一时期之两年，因处在抗战之特殊环境中，种种困难，不胜缕述，而经费又甚之绌，故按预定进度，不无衍期之恨”^③。故通志馆在杭州开馆后，全体修志同仁努力工作，加快进度。在采集史料、征集图书、撰述志稿等方面采取了有力措施，以达到“凡在第一时期中未竟之工作，大约可在本年度内完成之”^④的目标。并计划将三、四阶段的任务酌情缩短时间，以求尽快完成编撰目标。为此，在采辑史料方面采取一般采访、特种采访、委托采访、协助采访、直接采访等方式；加大了购置、征集图书的力度，采取购置、征购、捐赠等方式多方收集图书资料，并对资料进行整理、编目。通志馆的编纂人员还往浙江各地和上海查阅、抄录资料。对抗战时期统治浙江的日伪政权的档案资料，通志局也多方收集。截至1947年3月，共收集各种资料560类、9644件。^⑤次年6月，《重修浙江通志稿体例纲要及目》付印，共2万余字，包括总目29编，下分章、节、目，文征、杂记为附志，另有细目，供各专家学者提出意见。7月，《重修浙江通志初稿之（二）田赋篇》出版。浙江通志编纂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最终，《浙江通志》在历经6年编纂之后，采集志料在5万件以上，“成初稿一百七十四本，统计居全部分之六”^⑥，发展势头似乎向好。

① 《本馆第一次馆务会议记录》，《浙江省通志馆馆刊》，第一卷第三期，民国34年8月15日。

② 《本馆第一次馆务会议记录》，《浙江省通志馆馆刊》，第一卷第三期，民国34年8月15日。

③ 《浙江省通志馆业务概况》，1949年5月，L050-000-0097，浙江省档案馆藏。

④ 《浙江省通志馆业务概况》，1949年5月，L050-000-0097，浙江省档案馆藏。

⑤ 参见《浙江省通志馆业务概况》，1949年5月，L050-000-0097，浙江省档案馆藏。

⑥ 《浙江省通志馆简史》，1949年5月，L050-000-0097，浙江省档案馆藏。

但此时，省志编纂却遇到致命难题。抗日战争胜利，中华民族如凤凰浴火重生，人民精神振奋，国民党政府本应励精图治，和平建设。但国民党各级官员在接收时如疯癫般巧取豪夺，“五子接收”，中饱私囊，迅速败光了人民的信任。在这样背景下，省志编纂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问题。首先遇到的是财政紧张，因国民党政权积极发动内战，浙江财政十分困绌，通志馆难以维持，不得不争取社会捐助，虽暂时解决了部分问题，但仍难以持久。再之遇到人事上的不配合，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对省志编纂工作相互掣肘。尤其随着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战火逐渐延绵，民不聊生，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编修省志终成黄粱一梦。1949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浙江，通志馆解散，编纂人员遣散，省志编纂停止，仅留2名职员管理图书及资料，这次省志最终未能“生”成。

结 语

“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①浙江方志人秉持“文化复仇”精神，历经艰难，共采辑志料5万件以上，形成稿本125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移交浙江省图书馆保存。20世纪80年代，浙江图书馆重抄这部初稿并刻印，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进行了标点整理并正式出版，为新中国的省志编纂所参考。由此可见，重修浙江省志虽未完成，但仍有一定价值，是一项有价值的文化工程。这项文化工程在抗日战争这样一个艰苦、危险、困难的局势中启动，当时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沦亡，人才凋零，史料奇缺，人力、物力、财力皆极其匮乏的条件下，为民族优秀文化传承付出艰辛努力，体现了伟大抗战精神和民族精神。这次省志编纂在编纂理论、体例、内容上已呈现出现代方志的形态，是从传统方志向现代方志进化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其在很多方面的开创之功值得肯定，其编纂经验值得深入总结。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坚定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意志，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历史新征程！”^②抗战胜利本是民族“重生”的绝佳机遇，也是编修省志的大好时机，但国民党反动派却穷兵黩武，把大量物力用来发动内战，钳制民主和文化发展，最终致使省志“难”生。这是深刻的历史镜鉴！历史的鲜明对比，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各项事业的领导尤其是对省志编纂这种大型文化事业领导的重要性，以及一个强有力政权带来的稳定局势和强盛国力对省志编纂的保障作用。地方志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③，方志人在党的领导下坚定文化自信、自觉，才能开启方志未来。

（作者单位：浙江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本文责编：周 全

① 习近平：《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80页。

②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五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277页。

③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8期。